

唐宋八大家列传

苏辙传

蒋立文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列传

苏辙传

蒋立文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Suzhe Zhuan

苏辙传

蒋立文 著

责任编辑:吕海江

封面设计:章桂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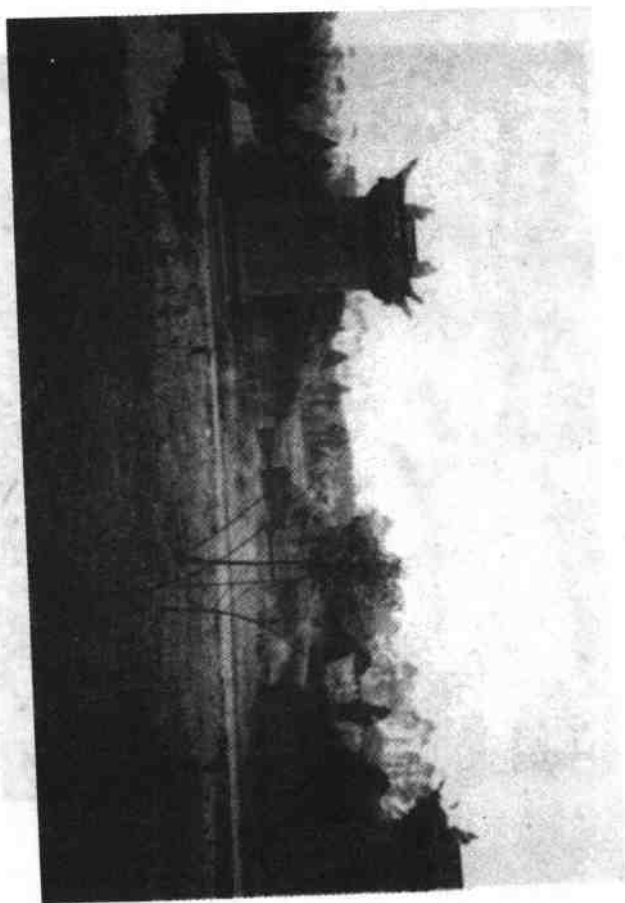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5插页 160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3 000册 定价:9.00元

ISBN 7—80626—300—4/1·57



苏 辙 传

眉山三苏坟



《唐宋八大家列传》总序

在古代散文史上，唐宋两代是自秦汉之后，出现的又一高峰。这期间相继掀起的两次波澜壮阔的古文革新运动，使唐宋文苑，名家辈出，异彩纷呈。古代散文，也因此而进入了它艺术上最为成熟的阶段。而在唐宋两代涌现的大批优秀作家中最负盛誉的，则是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

“八大家”的名称，来自明代散文家茅坤所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这种认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演变过程。其实，八大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便已经是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而蜚声文坛。北宋末年，邵博在论文时，也将韩、柳、欧、苏并称。其后，南宋的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一书，以为后学学习古文的典范，便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和张耒七家文为范文。至明初，朱右选编《八先生文集》，又在吕祖谦《古文关键》的基础上，去张耒而补入王安石和苏辙，于是便首次有了所谓“八先生”的称号。这一认识发展至明中叶，又因文坛上复古与反复古的角逐而得到了确认。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唐宋派作家一力标举唐宋古文，力图以有规可循的“唐宋模式”来替代无法可依的“秦汉模式”。唐顺之选编《文编》，于唐宋两代，便只录上述八家文章。接着，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问世，

“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唐宋八大家”的称呼因此也得以成为定论，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对于这一提法，清代以后，也有些人持有异议，但从总体上说，它还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经过较严格的历史的筛选之后，人们所达成的共识，这中间因而也就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崛起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相互间又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成为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坚，甚至领袖人物。他们共同为古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其次，是他们以自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散文的艺术宝库，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从林林总总的唐宋古文家中，遴选出这八家，并将他们的作品树作唐宋古文创作的丰碑，确实较好地反映了古代散文史上这一重要发展阶段的历史面貌，较充分地展示了古代散文走向艺术上成熟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八大家”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文学成就也有高下。以风格而论，韩文雄奇，柳文峻洁，欧文婉曲，王文劲峭，曾文醇厚，苏轼豪放，老苏恣肆，小苏澹泊，都自成一体。以散文成就而论，韩、柳、欧、苏（轼）最负盛名，其余四家，也各具风采。八家中，除苏洵外，又都能诗，又以韩、柳、欧、苏（轼）、王成就最高。此外，欧阳修和苏轼又是词坛大家，他们的词，在北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八大家”的文论主张与文学创作，是唐宋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产物。尽管除柳、王之外，其余六家都称不上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们和社会政治、却又都

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八大家”所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其顶峰开始下滑时期。江河日下，百感苍茫。面对这种时代的总趋势，有抱负的政治家们，屡屡力图通过革新朝政来扭转局面，维护那业已日过中天的封建秩序。柳宗元积极参与的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革新，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变法，便都是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变革运动。“八大家”的立场与政见尽管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些社会政治斗争的风暴里。斗争的残酷以及变革的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坎坷经历乃至人生悲剧。他们的诗文创作，也便都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知人论世”，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各自的生平阅历、性格气质乃至家庭环境、社会交往，从来都是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作家年谱与传记的撰写，因而也历来都为学术界所重视，“八大家”的研究也是这样。从清末梁启超著《王安石评传》，到一些古典文学知识丛书中如《韩愈》、《柳宗元》等传记的出版，进而到近十余年中出现的一些“八大家”评传，都反映出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缺乏比较全面的、统一的规划，“八大家”传记的撰写，总体上仍显得不那么均衡，或者体例不一，或者侧重点不同，或者具有较浓的学术考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雅俗共赏的《唐宋八大家列传》丛书的出版，也便有了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意义。读者将“八大家”列传相互比照进行阅读，或许会对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有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并永远铭记他们为华夏民族文化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王琦珍

1997年4月6日

引 言

位于方山东麓、北汝河畔的郑州（今河南郑县）古邑，自春秋筑城建邑以来，虽经秦、汉、晋、唐几度和战兴废，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却使它常常成为豫中一带客商云集、车船荟萃的辐辏之区。北宋政和二年（1112）十月以后，又因一代文学巨匠、故门下侍郎苏辙长眠于该邑郊外上瑞里的一片苍松碧草之间，为过往的游人墨客们平添了一处寄足舒怀的方寸天地，好像天公为了弥补某种创造的缺憾，特意给这座喧嚣陈旧的古邑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翰墨色彩。

直到南宋、元、明之际，不论初春、盛夏、深秋、严冬，这片三苏故冢始终吸引着不知几多八方游客前来瞻仰凭吊，酹酒祭扫，面对云海松涛、手抚重重碑铭，追先哲之遗迹，发思古之幽情，徘徊慨叹之余仍不免惆怅忘返。

白云苍狗，岁月悠悠，八百年光阴流逝，古邑面目已非。无情的风霜虽然抹平了故冢碑铭，摧尽了碧草苍松，并将先哲故冢遗迹埋进了滚滚红尘，可历史老人对先哲家世、生平、际遇、为人及功业的串串记忆却变得更加清晰。

苏辙原非郑州人氏，本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一书香世家，草字子由，晚年自号“颖滨遗老”。其先

祖“出自高阳（古帝颡项）而蔓于天下”，后代多居于赵州栾城（今河北省滦县），唐中宗神龙初年，有长史苏味道奉旨入川任眉州刺史，后苏味道死于任所而留下一子落籍眉山，是为眉山苏氏之始（苏洵《苏氏族谱》）。

眉山旧郡地处川中，自古即为形胜之地，南接峨眉，北望邛崃，东夹岷江，西通雅安。因得天地之造化而钟灵之气素盛，“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物产丰饶，人才辈出，故唐人盛赞其为“坤维上腴，岷峨奥区”（《眉山县志》卷一），堪称地灵人杰。苏氏一门自苏味道之后数代，虽一直以耕读传家，鲜见高官显宦，可到了残唐五代，大自然的灵性似乎开始有意光顾苏门，此后，苏门人才日见兴旺。

苏辙的高祖苏祐一生与五代相始终，贤名甚著，常“以才干精敏见称”，官至遂州长江尉，去职后隐居于眉之丹棱。曾祖苏杲虽没入仕，但平生为人潇洒豁达，轻财重义，乐善好施，“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爱敬之”，隐德颇高（苏洵《苏氏族谱后录下篇》引苏序语）。祖父苏序则大器晚成，为人疏达谦诚，急人之难，不务虚名。青年时不喜读书，晚年始发奋钻研，成诗多达数千篇，触物生情，信口而就，才思过人，“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间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当时川中因逢五代丧乱，学者衰少，民风率不重文，苏序独严教诸子倾心翰墨。在他的影响下，卒使眉人文气大开，民风渐变，此后数十年间，眉山竟涌现出学者千余人。晚年入仕，初任大理评事，累迁至职方员外郎（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公墓志铭》）。苏辙的二伯父苏涣，青年时即中进士，历官至都官郎中，利州路提点刑狱，一生为官廉明清正，常被时人誉为汉之循吏（苏轼《苏

廷评行状》)。其父苏洵，为人行事酷似乃祖，青少年时不喜读书，常与一二好友纵马游历，寄情于山水之间。二十五岁后始治学业，谢绝素所往来的同伴而“从士君子游”，十年后，因不长于“声律记问”之学而两度科场落第，遂绝意于功名，转而倾心攻研学术，晚年终成大器，成为北宋中期文学、学术领域的一代巨匠。

苏辙之仲兄苏轼，则是苏门众多子弟中的顶尖人物，一生为人心胸坦荡磊落，性情豪放不羁；善恶分明，耿介敢言；学识渊博，才气纵横，于诗、词、歌、赋、文、论、书、画、音律诸艺无一不精，所留作品甚丰，内中颇多传世名篇。尽管入仕后宦途艰难坎坷，际遇悲怆潦倒，但才名却远超其父苏洵之上，极为时人和后世所尊崇。

苏辙其人，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文气鼎盛、人才济济的书香望族，自幼便秉山川之灵秀，承先世之遗风，宗父兄之学业，在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起伏迭荡、悲喜交融、复杂艰辛的人生旅程，卒以毕生的心血与精力摘取了一代文学宗师的辉煌桂冠。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砺才志十载寒窗 求功名万里出川	(1)
第二章 题金榜名动京华 直对策初宦受挫	(36)
第三章 入制司指陈变法 忤上意宦海沉沦	(76)
第四章 获圣眷扶摇直上 竭至诚辅佐新君	(114)
第五章 涉党争远谪岭南 避祸难归隐颍滨	(174)
跋后	(221)

第一章 砺才志十载寒窗 求功名万里出川

国家惊变小苏降世

莽华夏神州，自唐末以降，乾坤复现逆运，太阿为之倒悬，群雄蜂起，四处鏖兵，攻伐逐鹿，兴替频仍，早将一派锦绣江山闹得烽火连天，征尘四起。渺无穷期的战乱夷平了通都大邑，扫灭了田园村庄，劫后的世界，只剩下一片片废墟瓦砾和斑驳惨凉的断壁残垣。百姓颠沛流离，路野饿殍枕藉，落宿无鸡鸣，千里炊烟绝，遍地萧杀起，举目尽疮痍。人心寒，不敢怨，徒哀叹！真可谓：

残唐五代乱离间，
遍地鏖兵起狼烟，
朱李石刘郭频继，
倾孤覆国紧报还。
自古兴亡累枯骨，
荒冢堆得旧江山

堪叹众生离乱苦，

谁把吴钩作刀镰？

斗转星移，沧桑不改，可催征的鼓角却不知淹没了几多慈母祈盼怨妇泪，战尘硝烟更不知淘尽了多少将军白发征夫血。待世态凌夷至五代后晋开运三年（946），方由兵连祸结的河北涿州（今河北涿县），闯出了一位姓赵名匡胤的少年英雄，年届双十，便以一条杆棒从军行伍，凭借一身雄才伟略，相继辅佐后汉、后周角逐霸业，率精兵猛将北抗契丹，南凌江汉，金戈铁马、餐风露宿，运筹帷幄、千里争锋。经十五载南征北讨、东拼西杀，最终扫灭群雄，打平了四百座军州，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基定鼎，成为北宋王朝的第一位九五至尊。

天下初平，万众归心，朝野相庆，举国弹冠，人心思治。按常情，本应该晏武修文，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征夫洗尘，百姓歇肩，省税赋、轻徭役，休养生息。只可惜，宋太祖于吊民伐罪之时未能坚持后周世宗柴荣所制定的“先北后南”的统一战争原则，相反却施之以“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不幸错过了辽国在穆宗时期君昏臣乱、国弱民穷的最佳北伐时机，遂使辽国安然度过了内部危机而迅速坐大。待南方群雄被次第削平之后，辽、宋之间南北对峙之局业已势成骑虎。太宗朝为了毕边患于一役，肇久安之长计，被迫兴兵首启战端，数与辽军决战于长城内外及幽、云之间，结果竟是损兵折将，败多胜少。直弄得丁男万里赴戎机，丁女转输入北边，慈母盼儿儿不还，赋税重，徭役繁，百姓苦不堪言。到了真宗咸平年间，辽国开始由弱转强，反守为攻，频频悬军南侵，战火一直燃至黄河沿岸，打得宋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京师

为之震动，朝野不免惶惶。多亏宰相寇准胸有定见，力劝真宗御驾亲征，收人心、鼓士气，射辽帅于阵前，挫敌锋于澶州。总算使辽宋双方休战罢兵、分界立盟，各守疆土，通使报聘，赢得了宝贵的和平与安宁。

可怜芸芸众生们实指望自今尔后能天下无事，各安其业，永享太平。无奈宋廷君臣没能很好地珍惜这段用沉重代价换来的南北和局，居安思危，奋发进取，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讲信修睦，安抚诸戎，行富国强兵之良策，探长治久安之深谋。相反，却陶醉于眼前的歌舞升平，胸无大志，无所作为。只知骄奢淫逸，苟且偷安，哪里还管什么强敌在北、百姓饥苦。可惜好景不长，三十年升平弹指即逝。当北宋王朝步入仁宗景祐末年，刚刚呈现出的国泰民安局面，很快便被一群醉死梦生、贪婪成性的腐败权贵们弄得昏天黑地、民怨沸腾。

先贤有云：民为邦之本，土为民之命。民安于土而乐于业，方能国运昌而王道兴。故自古名君贤相无不把打击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四民安定作为治世之根本。可笑北宋王朝的诸多权贵们却不知自量，独反其道而行之。以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为我物”（王明清《挥尘录余话》卷一引王铎《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于立国之初便不抑兼并，不立田制，怂恿豪强大族蚕食小民。遂使土地兼并之风，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以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宋史·食货志》）。无数小民无立锥之居，为生计所迫，离乡背井、走死逃亡者日渐增多。国本既动，天下岂有定安之理。而于选官分职之事，则又广开科举、恩荫等诸多途径。数十年间，登榜入仕者，有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致使各级衙

门日益臃肿膨胀，未届仁宗末年，在籍官员之数就已“十倍于国初”（《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八）。更兼大宋天子一向皇恩浩荡，“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在官者安享厚禄，小民百姓却难胜其荷。致于武备一事，宋廷自开国以来便严守“养兵”之成规。澶渊订盟之后，虽久无征战，兵骄将惰，暮气日深，可冗兵庸员却与日俱增。太祖开宝年间，合禁军、厢军总额不足38万，至仁宗皇祐之际，兵员已猛增到140万有余，年耗军饷4800余万缗，竟占国家每年财用总额十分之六、七（《蔡忠惠公集》卷一八《论兵十事疏》）。加之宋廷君臣奢侈挥霍日益无度，仅祭祀天地的郊礼之费，真宗景德之际岁支已达600万缗，至仁宗皇祐年间竟增加到1200余万缗。如此作为，虽系北宋王朝诸多弊政中之寥寥数端，却已弄得朝廷财用枯竭，国弱民穷，天下嗷嗷，危机四伏。仁宗宝元元年（1038）之后，终于酿成了一场几乎倾动天下的大祸乱。

早在太宗淳化初年，银川（今陕西米脂东北）党项族酋李继迁始拥众尊辽，受辽西夏王封号，常与北宋分庭抗礼，攻州夺县，势甚猖獗。是时，宋与辽军大战正酣，无力用兵西陲，只好暂行羁縻之策笼络其心，遣使颁诏，策封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赵氏国姓，赠名保吉。真宗时，改授其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吉便借宋之名举兵攻辽，袭取夏、银、绥、宥、静等五州数千里之地。真宗咸平五年（1002），保吉背信，兴兵东侵，攻占北宋之灵州，更名为西平府，其势更加雄强。次年，赵保吉于西攻吐蕃途中中伏败死。其子赵德明生性懦弱，素无大志，尚无开疆拓土的举动，但其孙赵元昊却是一位旷世枭雄，为人聪敏机变，沉稳干练，胸藏鸿鹄之志，腹有管

乐之谋，早有并吞关西各族，东向与宋、辽放手争衡的野心。仁宗天圣九年（1031），赵德明病卒，元昊袭父职，统率党项诸部迅速拉开了对吐蕃、回鹘的兼并战争，于景祐三年（1036），连占瓜、沙、肃三州，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统一了关西地区。宝元元年（1038），元昊终于利用北宋君弱臣昏、国困民怨之机，挟关西各部举兵叛宋，建国大夏，恢复李氏祖姓，立官职、定兵制，创西夏文字。此后，连年兴兵东侵，强行将北宋王朝再度拖入了旷日持久的夏宋战争之中。

西陲风云突变，关塞警报频传，一时间，汾、泾、渭、延、秦、庆各州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入汴京，惊得宋廷君臣六神无主，寝食难安，被迫向各路、府、州、县征兵调将，摊粮派饷，昼夜西援，朝野不免汹汹，天下为之骚动。待战争持续到仁宗庆历年间，士兵、百姓早已不堪忍受繁重的兵役徭赋之苦，纷纷揭竿斩木起而造反，真是外战方兴，内乱迭起。如此严峻的内忧外患，怎不把一派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搅得风雨飘摇、衰象毕露！可叹宋室君臣：

居安享乐不思忧，
只贪江天画梦游，
厌恋众香千百度，
那顾遍地黄花瘦。
一旦西天雷霆起，
恶风吹来满目愁，
回首惊视残花尽，
严霜过处已是秋。

国运不济，天道难违，自不待言。单说蜀中眉州眉山苏氏一族，自北宋王朝定鼎以来，家道之兴衰好似与国运息息相